

专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

# 姚洋：发展民营经济长效机制是改革，而非行政命令

■ 本报记者 李庆



## 用更加制度化手段管理机构

《公益时报》：北大国发院是经济学家、管理学者云集的机构，汇聚各学派高端智囊，作为院长，你如何管理这样一个特殊的机构？

姚洋：北大国发院的特点就是名人比较多，管理这样一个机构最好的办法就是搭建一个开放的平台，让每个人在这个平台上展现最好的自己。

林老师（林毅夫）和周老师（周其仁）并未对我提出什么要求，但我会心里有疑问的时候去找他们聊，他们都会指点我，为我出主意。对我来说，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更好地过渡。林老师作为创始人，可以用个人的影响力来管理机构；周老师被广泛尊重，可以用精神力量影响大家；到我这里我就需要用更加制度化的手段来管理这个机构。

过去这几年，我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建立起北大国发院内部的管理制度，从而做到透明、公正。北大国发院员工的队伍比老师的队伍大，员工的管理也比较特殊，虽是一个学校机构，但在某些方面又像企业，却又不是企业，所以得在其中找到一个平衡点，既要建立起一套制度来，同时又要充分发挥大家的积极性。我们是一家同仁机构，要在规则和灵活性、积极性、认同感之间找到平衡点。经过这几年的摸索，这方面基本上是调整到位了，运作起来也比较流畅了。

《公益时报》：作为 25 家国

家高端智库之一，北大国发院自身区别于其他智库的定位是什么？北大国发院的学术研究、学员培养是不是也和这个定位紧密相连？

姚洋：我们是高校的智库，区别于政府部门的智库，政府部门的智库有很多国家的任务。高校智库不擅长做国家直接的任务，更擅长做一些分析性的工作，离政府稍微有些距离，这样反而能把政府的运作、政策看得更清一些。在参与一些政策的讨论过程中我们会关注一些中长期的问题，关注一些国家比较深层次的问题，在这方面我想我们和学校外面的智库比起来有很大的优势。和其他高校智库相比，我们的规模比他们大，另一方面我们非常注重学术研究，所以，我们的智库有一个原则——用学术推动中国的进步。

北大国发院的学术研究、学员培养也是和这个定位紧密相连的，我们的教育项目囊括了政、商、学三个方面，我们帮学校管理南南学院，该学院是培养官员的；我们有 MBA，是培养商业领袖的；我们还有学术项目，是培养学术性人才的；我们还有一个本科生双学位项目，那是普及性的项目，一年一届招生至少 700 多人，规模较大。我们的教学项目很多，学位项目有约 10 个，教学任务很重。

## 发展民营经济长效机制是改革

《公益时报》：前段时间，“民营企业退场论”引发热议，你近

姚洋的办公室在朗润园 501，这是个不大的办公室。

进门处有两张书桌，一张临窗，一张面墙。面墙的书桌上摆放了电脑和家人的照片，连在一起就占据了屋里一整个角落。桌旁是椅子，椅子旁摆放着小沙发。除了这些简单的陈设，剩下便是满屋子的书。

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、院长和著名经济学家已经成为了姚洋身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（以下简称“北大国发院”），这个中国顶尖学术大咖云集的地方，汇聚了各个学派的高端智囊。北大国发院前两任院长是林毅夫和周其仁，姚洋觉得，前者是北大国发院的旗手，后者是精神领袖，自己在管理方面没有两位前任“一呼百应”的号召力，因此，他强调用更加制度化手段管理机构。

作为北大国发院的院长，除了搭建开放的平台，让每个人在这个平台上展现最好的自己外，姚洋也非常重视人才的引进，大胆招贤，他认为人才的聚集能够发挥集聚效应。“你要去找那些比你更有能力的人。”姚洋说，“所以我把张维迎和陈春花两位老师都请来了。陈春花老师很特别，她在管理学方面能力特别突出，而且还有担任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CEO 那样实际的管理经验。她来了之后我们做了一对一导师制度，每一个 MBA 学员都有一个业界的导师；对 EMBA 也进行了改革，加入了很多实用的课程；此外，陈老师跟业界的联系比较多，为我们带来了许多业界的资源，包括资金方面等。但是由于她是教师系列的第一位非“海龟”学者，还是引起了大家很多轮的讨论。”

作为著名经济学家，姚洋在今年上半年对民营企业做了调研，在“民营企业退场论”引发热议时，他及时针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问题进行了发声。

“从研究角度来讲，我们不可能做政府关注的日常工作的研究，这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或者国际交流中心负责，社科院也相对更近，在这方面北大国发院没有太强的竞争力。我们做的最重要的、最常规的，还是通过媒体和公共空间的讨论，通过舆论影响政府的决策。”姚洋告诉记者，从名字看，“国家发展研究院”是一个与中央比较接近的单位，但是原来两者的距离，比很多人想象中的要远很多，而北大国发院离社会和百姓，比我们想象得要近的多。

12 月 21 日，2018 中国公益年会在北京·国家会议中心开幕，姚洋受邀在年会发表主旨演讲。姚洋认为，中国公益年会应该变成企业家互相交流公益经验的一个平台，而公益的最高境界则是将其做成企业战略的一部分。

期也针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问题进行了发声。你认为，实行国企混改制究竟有哪些利弊？在国有资本相对强势的情况下，国企收购民企股权会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？

姚洋：今年上半年股市股价下降了超过 30%，很多民营企业下降更多，有的下降达 70%，很快面临着平仓线。但是这些企业其实都很好，如果被强制性平仓，那它的资产、价值就会变得极低，远远低于它应该有的价值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民营企业资金短缺，只有国有企业有钱，因此国有企业就开始收购这些面临平仓的民营企业。我觉得这样的收购要从纯粹商业的角度来看，没有问题——你既然这么困难，我来收购你，还帮你把债务负担了，这属于纯商业的行为。问题是，在我们国家，特别是过去半年里，民营企业受到很大的压力，又出现“民营企业退场论”

这种说法，如果国企还去收购民企，就会发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——“民营企业退场论”是真正地实施了。这样就会打击民营企业的信心，这当中很多都是民营企业家一生的积累，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，这个影响太大了。这就像当年的“宝万之争”，宝能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也没什么错，但是放大了说，一个“野蛮人”跑来把企业收购了，并且一脚把创业者踢开，这个影响很大。国家在过去一个多月里，出台了很多的政策，“民营企业座谈会”的召开对提振民营企业的信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现在来看，市场处于基本稳定了，这是一件好事情。

《公益时报》：11 月 1 日，习总书记邀请民营企业召开座谈会，并针对当前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提出了 6 方面政策举措。那么，你认为，此次座谈会将为民营企业具体带来哪些利好？接下

来，你认为民营企业还将会遇到哪些挑战和危机，应如何发展民营经济？

姚洋：习主席、刘鹤副总理带着银行三会的领导出来讲话，这是个非常强的信号，提出的六方面政策举措大体可分为两类：一类是救急的，救急的那些措施现在看来在陆续推出，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；另一类是长期的，长期而言如何给民营企业提供比较充足的金融资源？这个需要具体事件具体分析，比如郭树清提出的“一二五”概念，其实股市对这个反应是非常负面的，提出来第二天银行股集体跳水了近 3%，说明大家不看好。

我们要意识到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是全世界的难题，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带上太多所有制的成分，即认为这主要针对民营企业。其实国有企业如果规模大小，也照样贷款很难，所以，这不是所有制的问题，就是小企业风险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非得让银行给它贷款，这个做法是不对的。

我觉得长效机制还是改革，不能靠行政命令，对正规银行要允许它们对风险进行定价，中小企业风险高，若去银行贷款，银行觉得资质可以但风险很大，12%的利率能否接受？中小企业要到“影子银行”去筹款，恐怕也是这个利率，甚至更高。所以，一定要允许银行对风险进行定价，现在的定价机制太死板。北大国发院多年来提出的利率市场化事实上还没有实现，如果把这项改了，会是一个技术性的改变，它的作用就会非常大。



朗润园一隅（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）

（下转 07 版）